

# 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萧云岭

(井冈山师范学院 政法系, 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中国近代会党组织的许多特点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少特点有相通或相近之处,因而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联络不仅有了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正因如此,会党内固有的缺陷与革命派自身具有的弱点相互渗透,共同影响,成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会党;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败因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2)01-0027-05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XIAO Yun-L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Jing Gang Shan Teachers' College,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in pre-modern China and the early organizations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Hence it was possible and inevitable fo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groups to connect with the secret societies. The secret societies became the basis and main force of the revolution. Thus the innate flaw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bourgeoisie worked together,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secret societies;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groups;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自然很多,也很复杂,史学界已深究了不少。其中会党对辛亥革命的影响问题,学界也有所讨论,但所论多是局限于会党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特别是对孙中山的影响。笔者以为,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整体与会党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必然性。

### 一

历史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民族资本主义才在中国社会的夹缝中艰难诞生和发展起来,其利益代表者——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通过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与此恰恰相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游民无产者阶层。史载,在咸、同时期,此种“无末业可治,散而

游幕”的游民“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sup>[1]</sup>。这些社会地位卑贱被统治者视同匪类、目为莠民、生活极不安定、最无保障的游民,受秘密结社的传统影响,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以“反清复汉”为宗旨的会党组织。会党组织的许多特点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少特点有相通或相近之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联络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必然。

(一)进入鼎盛时期的近代会党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反清复汉。早期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反清者,排满也;复明者,实复汉也。会党后期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复明”口号日渐少用几至消失,但恢复汉族人的统治政权之意识仍然深深地根植于其头脑中。反清宗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纲领相通,特别是与革命派早期“驱除鞑虏”的思想相通。因而构成了革命派联络会党相当重要

收稿日期:2001-09-16

作者简介:萧云岭(1967—),男,江西泰和人,井冈山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一个因素。其二,反帝性。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频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激起了中华民族的仇恨和反抗,而会党群众的这种仇恨与反抗表现得更强烈、更直接。全国各地大闹“教案”,大都是会党群众的杰作。譬如,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浙江会党群众常常闹“教案”,并以“仇洋主义”为宗旨。当社会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以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联合镇压国内人民的反帝运动时,“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sup>[2]</sup>(P597)。日本学者平山周先生在调查中国近代会党情况时说:“自近时革命党人入其中,说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满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为倾复满政府,仇洋主义转以消灭。”<sup>[3]</sup>(P28)他看到了斗争形式的变化,但会党群众的“仇洋主义”真的“转以消灭”了吗?恐怕平山周先生终究还是不了解中国的会党群众。1904年以后,浙江等地会党群众反抗教会侵略的“教案”经常发生便是明证<sup>[4]</sup>。其三,大批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组织,并很快成为会党组织中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比如,与孙中山堪称“莫逆”的郑士良,曾求学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为三合会头目之一<sup>[5]</sup>(P23);浙江会党的主要组织是属哥老会系统的终南会,有沈荣卿、张恭等一批读书士子和青年学生加入。这在官方文献中也有所反映。浙江巡抚张曾敬上奏朝廷:“有学界中人如笠绍康、吕风(逢)樵、赵宏富(甫)、沈荣古(卿之误)、许道亨等,及举人张恭,廪贡生刘耀勋,生员王金发,武生倪经等,皆以士流而为党目。”<sup>[5]</sup>(P95)这种性质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成为革命派联络会党的中介和纽带。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较为深刻,与下层群众的距离较近,具有同情下层群众、关心下层群众并力图改变下层群众生活状况的愿望。这里的下层群众实际上已包括了会党群众。有些人公开表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穷困无靠者谋取社会生活”,使“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sup>[6]</sup>(P237)。当然,会党群众与一般群众又有所不同,他们是一支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尽管其组织形式带有极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清政府对他们的不可容忍,迫使他们生活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也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反抗情绪比一般群众高出一个层次。孙中山曾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sup>[7]</sup>(P172)所以,会党群众既被革命派看成解放的对象,也被看成是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

(三)武装斗争的方式也成为两者联系的纽带。会党通常都拥有武器,各种反抗方式中,武装斗争是其首选。更何况有些本来就出身行伍,是社会上现存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且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已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建立前夕,重大会党起义达三十余次。这无疑对革命派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革命派是抱定了走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迫切需要一支

武装队伍,更何况革命派偏重于军事冒险。所以,会党自然被看成是最理想的对象了。

(四)革命派看不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巨大社会力量,认不清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而只把他们看成期待自己去解放的大众。因而也就更热衷于联络会党,并且希望通过做少数人的争取工作去掌握较多的帮会群众。会党首领或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或是清军中被遗弃的一介武夫,或是官场失意、求仕不达的民族主义与叛逆精神杂糅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较容易同革命派联盟。再说,会党领袖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在革命派看来是相当可取的。因此,革命派在实际上往往是通过与会党头目的联系来掌握头目所辖的一部分帮会群众。如光复会领导人之一徐锡麟1905年2、3月间,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联络会党,回绍兴后对同志说:“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sup>[5]</sup>(P56)所谓“俊民数十”即数十个会党首领。革命派这种投放精力于会党首领的方法也恰恰是与其力量弱小相一致的。

(五)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在兴中会建立之前就与会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走上革命道路也发轫于联络会党。中法战争前后,广东地区的会党活动相当频繁。1886年,广东惠州宁山地方“有三合军三千,抗官起事”<sup>[3]</sup>(P28),对孙中山触动颇大。从此,他开始联络会党,并结识了会党分子郑士良、尤列等人。在革命初期,孙中山十分重视会党,认为革命“应该以改良会党为入手办法”<sup>[8]</sup>(P19)。这无疑加强了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可能性。

## 二

1894年11月,孙中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次年设总会于香港。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大半是会党分子和兼具会党身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香港总会的会员中,现有案可查者为49人,除7人身份不详外,其余42人中即有会党分子14人,约占总数的30%<sup>[9]</sup>(P105)。据《尤列事略》载,1895年计划由香港开赴广州起义的会党分子二百余名,也“全数加入兴中会”<sup>[10]</sup>(P503)。1899年11月,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头领集于香港,三会合并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sup>[11]</sup>(P105)。

1905年,孙中山到达日本,积极团结各方志士,汇集各路英俊,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联合为基础创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华兴会是以湖南哥老会为基础的,成立后不久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了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sup>[12]</sup>(P81)。其宗旨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光复会的会党气息也很浓:(1)光复会从1904年创建以来,以反满革命为目标,誓称:“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sup>[13]</sup>(P127),核心为“光复汉族”。这一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基地浙东,历来为报仇雪耻之乡,卧薪尝胆之地。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反满的民族思想和反封建专制的反传统思想,对光复会成员影响很深。“总之,不离吕(留良)、全(谢山)、王(夫

之)、曾(静)之旧域也。”<sup>[14]</sup>(P305)在杭州求是书院、武备学堂和光复大本营绍兴的大通学堂,都悬挂着这样一幅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原尔多士修麟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反清复汉成了其宗旨的全部涵义。(2)成员的地缘性。光复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属浙东地区的会党群众,领导骨干也大多为浙东籍的会党首领,如陶成章、张恭、沈荣卿、刘耀勋、笠绍康等等。而且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虽然秋瑾等人加入了同盟会,但仍有徐锡麟等人“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始终没有入同盟会<sup>[15]</sup>(P56)。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盟会的基础没有脱离会党。这在内地江西也同样可以得到证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以湘赣同心合作相关密切”<sup>[16]</sup>(P254),遂派黄格鸥、魏会英等回到江西,在南昌赐福巷建立了同盟会支部,黄格鸥任支部长,聚集革命力量(主要是会党力量)。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邹永成动员会党领袖董福开,集合手下多人,成立了黄自强公司(秘密名称叫赣江堂),有的史书称之为“自强会”,“以联络(湘、赣)两省会党合谋革命为宗旨”,“也是准备在那里作华兴会(笔者按:此时同盟会已创立,华兴会名亡实存)长沙起义响应”<sup>[17]</sup>(P8)。萍乡、九江均设机关。

此外,革命派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党(大陆会党和海外华侨会党),这也是会党作为革命派团体革命基础的一个重要表现。檀香山兴中会“条规”之二规定:“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费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sup>[18]</sup>(P19)如前所述,入会者多为会党分子。华侨会党分子邓荫南在孙中山募得款数“不满美金二千元”的情况下,“鬻产得资万元”以捐助<sup>[15]</sup>(P4)。广州起义时,急需资金,郑士良毁家赴义,“捐其全部家产”,以解燃眉之急<sup>[19]</sup>(P217)。广州事败后,兴中会经费日渐紧张,又得到会党分子李纪堂的大力捐援,“党人之给养补充及遣散扶恤等费”,“大部由纪堂解囊供给之”<sup>[15]</sup>(P159)。据李氏称,仅惠州起事,他就“垫去十八、九万元”<sup>[16]</sup>(P39)。其实,自1900年起,兴中会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机关和报务费用“皆仰给于纪堂”<sup>[15]</sup>(P159)。倘若无会党之资助,革命派之革命就可想而知了。

会党不仅是革命派团体的基础,还是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张难先曾深有感触地说:“时主力在会党。”<sup>[20]</sup>(P20)1895年广州起义中,计划担任发难的队伍,基本上为会党分子。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爆发,充任先锋的是会党首领黄福,他率领会党分子八十余人猛扑沙湾,斩敌四十,夺枪四十,擒敌三十余,首战告捷。义军在四十天内,四次重创清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参与此役的陈少白追忆道:“其时我们所预备起事的人分两种,一部分就是新安县的绿林,……一部分就是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sup>[21]</sup>(P103)义军队伍也发展迅猛,所到之处,均得到会党响应,至三多祝时,竟拥众约两万人。粤都德寿惊呼:“各路会匪……同时并举,云集响应。”<sup>[22]</sup>(P244)有

人初步统计,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发动、领导的大小起义均有会党分子参加,所谓“义军之起,无役不与”<sup>[23]</sup>。而且在许多重大起义中,会党分子无论在人数上抑或在战斗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三

会党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的基础,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生力军,那么会党的许多内在的固有缺陷如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流氓意识、无组织无纪律(按指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等就必然带进革命队伍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些缺陷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固有的弱点互相渗透,最终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

如前所述,同盟会创立后,虽已纳入光复会,但光复会团体“故在”:徐锡麟等领导人不入同盟会,连秋瑾也是二重身份,既是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主盟员,又是光复会的协领,而一般成员更不知同盟会。“方光复、同盟会之合于日本东京也,内地如江、浙、安徽,尚沿光复旧名”<sup>[14]</sup>(P310)。1907年,秋瑾、徐锡麟发动浙皖起义,秋瑾“因与徐锡麟订约合作,故一切进行规划,咸以光复名义行之”<sup>[14]</sup>(P344)。

1908年9月,“故在”的光复会实际领导人陶成章去南洋募捐时,与同盟会、孙中山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陶要求孙为他筹款五万元以维持《民报》的出版和作为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孙与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极不满,而陶支持章。孙对陶来南洋活动也存有戒心,加上当时确实经济困难,孙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sup>[24]</sup>(P427)。因此,陶炮制了一份《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即后来的《孙文罪状》),要求罢除孙的总理职务,并声称“本光复会,由来已久……更改为难”<sup>[24]</sup>(P698)。1909年,内部纷争升级,陶动员章重建光复会(使“故在”的光复会复名)。“焕卿(陶成章)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sup>[17]</sup>(P112)。于是,陶回南洋,在李燮和的支持下,将新加坡、泗水、檳港、爪哇、缅甸仰光等地原来的同盟会机关改成为光复会机关。1910年2月,“复兴光复会于东京,公举章太炎为总会长,先生(陶成章)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行总部”,“又在东京组织《教育今语》杂志”“以为通讯机关”。重建的光复会继续“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sup>[14]</sup>(P310)。是为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五年而复分”。

孙中山说:“二党(指同盟会、光复会——引者注)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迹,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端,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sup>[18]</sup>(P46)后期光复会总会长章炳麟也说了意思基本相同的话。真是“惟以名为争端”吗?恐怕孙、章都没有触及分异的实质,会党的猜忌、

提防、宗教、迷信、封闭、保守、排斥、破坏、皇权等意识(这一切乃会党的宗派性、地缘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大环境里发展嬗变而来)以及革命派由于本身固有的弱点和阶级局限而不能有效地改造、团结、利用会党,才是导致两者最终分裂的实质,也是同盟会最终涣散、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试作具体剖析。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紧张的反清革命斗争中,并未把自身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视为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而会党是最缺乏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社会团体,它作为革命团体的基础,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更缺乏内部统一必要的制度和纪律。1907年8月,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东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会员集议于东京,成立共进会,推孝义会头目——被称为“双刀子张邕”张百祥为总理,目的是进一步广泛地联络会党。起初,共进会与同盟会分异并不明显,1908年5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起义,共进会的居正、孙武都曾赶去参加。起义失败,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这年夏,黄兴、谭人凤自安南回到东京,黄问焦达峰(哥老会头目、共进会领导人):“何故立异?”焦答:“同盟会举止舒缓,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复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sup>[20]</sup>(P232)谭人凤则以为共进会模仿会党,“反文明而野蛮”,尤力持不可(由此也可见革命派——至少革命派的部分人甚至把会党团体视为野蛮群)。但焦等意志坚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进行”<sup>[17]</sup>(P39)。是为目无革命制度与纪律之典型。

**(二)会党的宗旨与革命派的纲领有相通之处,但二者的本质仍有异。**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汉。反清是前提,复汉才是目的。反清在客观上当然带有反封建性,但最终是要建立汉族的封建王朝。因此,本质地说,会党本身不具有反封建性质。民初活动遍及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安徽的“大把子香”、“海龙会”都打出“皇帝”旗号,企图反对共和,恢复帝制,认为“非推翻民国不可”。这与革命派的反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三)会党的秘密暴动、小规模起义、暗杀等斗争方式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崇和接受。**这与革命派力量弱小、认识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一致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就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sup>[25]</sup>(P330)因此,孙中山提出“毕其功于一役”,没有看到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从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发动他们。

**(四)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提出革命应以改良会党为入手办法,但却未能改造好会党。**1907年以来,会党习气——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使同盟会内部纷争不已,孙中山为此伤透了脑筋,产生了“重新组织团体”的念头。他在1909年的一封信中说:“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其盟书却称为《中华革命

党盟书》,誓词也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主主义”<sup>[18]</sup>(P439)。同盟会面临涣散之命运。笔者又何尝不赞成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更先进的革命团体甚至资产阶级政党?但革命派并不曾对会党之消极面及其他致命性缺陷,作根本性的改造,如以会党分子为骨干的共进会宣称:“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sup>[17]</sup>(P13)这完全是会党宗旨的翻版。同盟会的迅速涣散与此不无关联。孙中山曾喟然叹息道:“彼众皆知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为原动力也。”<sup>[7]</sup>(P197)在新的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及资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前,同盟会的涣散或团结对革命影响极大,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武昌起义胜利后,会党的消极影响更甚。在湖南,“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sup>[26]</sup>(P134)。在贵州省会城市,哥老会“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域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sup>[27]</sup>(P134—135)。贵州革命党人胡刚、吴雪传说:“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确是革命政权失去全国人民拥护的最大原因。”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sup>[17]</sup>(P112)。湖北有七星会、同袍会、红灯会、绿带会、九龙会、天王会等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其他各省也有类似情况,甚至过之而无不及。如前文提到的安徽海龙会,声称“非推翻民国不可”。江苏扬州孙天生率领“定字营”兵丁起义,在镇江策动新军反正的革命党人李竞成,竟徇扬州商会会长的请求,偕同青帮头子徐宝山前往扬州,杀害孙天生等七十余人<sup>[28]</sup>(P293—319)。

**(五)革命派深感“会党发动易,成功难;既成而器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sup>[29]</sup>(P11),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好选择了镇压会党的手段。同盟会会员张奚若去上海时,井勿幕就写了两封亲笔信给他,让他“见到黄克强(大元帅)和黎元洪(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川驱除哥老会势力”<sup>[13]</sup>(P155)。广东陈炯明镇压王和顺所部惠军更是典型。王和顺为广东会党头目之一,他率部参加革命很早,也颇具革命素质,功勋卓著,在广东独立后竟遭镇压。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就极尽屠杀之能事,并自炫:“景华以杀人著,夫人皆知。”<sup>[30]</sup>(P189)在镇压王和顺的过程中,清朝降将龙济光、吴祥达均“分兵前往助剿”。而在二次革命期间,也正是

龙济光配合袁世凯镇压了广东革命运动。历史在这里又安排了一出讽刺剧。当然,弹压会党也是以党目为刃口。湖南会党首领焦达峰、陈作新,上海的陶成章,广东的许雪秋等皆成为刀下鬼。会党首领遭到弹压,大量会党群众被遣散,他们得不到革命派的妥善安置,更谈不上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以至“生活发生困难,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sup>[31]</sup>(P117)。和会党联系密切的农民,则由于农村大环境没有甚么变化,他们未能通过革命改变受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大多数仍不得不“分立义堂,强割早稻”,以维持生计。

结果,革命派起初对会党缺陷的容忍不自觉地腐蚀了自己的墙脚,此时的弹压行径更是挖掘自己的墙脚。这种可怕的内耗,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终无力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为袁世凯一伙所窃取。

#### 参考文献:

- [1]汤成烈·治赋编三[A]·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四[C].
-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3]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 [4]蔡少卿·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A]·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6]国父全集[M]·台北:中正书局,1973.
- [7]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8]蔡奇鸥·鄂州血史[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 [9]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一册(上)[M]·台北:中正书局,1971.
- [10]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尤列事略[A]·革命先烈传[C]·台北:中正书局,1965.
- [11]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2]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 [13]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 [14]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15]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6]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25号)[C]·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8]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9]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编·近代中国:第26期[J]·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2.
- [20]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 [21]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M]·北京: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
- [22]辛亥革命(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 [23]致内务部警政司呈文[A]·历史档案[J]·1982,(1).
- [24]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C]·台北:中正书局,1965.
- [25]蔡元培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6]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 [27]冯祖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 [28]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29]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30]陆丹林·革命史谭[M]·南京: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
- [31]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戴利朝)